

## 在婆娑的知識之洋，讓我們一起航向海平線

周婉窈

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第一次看《綠的海平線》，當下的反應是，又羨慕又嫉妒。不是為我自己，而是替「台籍日本兵」感到又羨慕又嫉妒——如果他們也能遇到郭亮吟導演，該多好！但是，他們的世代已經凋零殆盡，絕大多數人抱著各自的故事，永遠沉默了。就此而言，台灣高座海軍少年工員非常幸運，他們有郭導演，為他們拍了一部深刻而感人的紀錄片。

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，尤其是以日治時期最後八年為研究重點的我，最感到難能可貴的是，這部影片多少把我們帶回歷史的情境，為我們把過去「召喚」到當下。在舊照片、發黃的書信、記事簿、戰爭紀錄片，以及當事人的回憶之外，最令人驚喜的是看到海軍宣傳片《制空》。若不是郭導演鏗而不捨地訪尋，這部影片很可能永遠「塵封」於日本電影資料館；但是，這樣一部電影對我們感受當時的時代氣氛又是多麼具有直接的力量！郭導演不止使一部舊影片復活，她實際上使一個已經過去了的時代，有了新的生命。

除了時代大背景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幾位少年工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。在訪談中，他們的語言很多樣，有講閩南語、有講客家話、有講日語，也有講一口大陸口音的普通話。吳春生、吳春即兄弟一起搭電車預計返鄉，哥哥決定留下來，小雨中一別，數十年後，一個講閩南語，一個講日語。語言是歷史的產物，也為我們書寫著歷史。這些小人物在時代的大變

動中，或順應環境，或做出自己的抉擇，其結果非常不同。他們在神奈川縣大和市的分別，讓我想起某位哲人的話——存在是處於「被拋」的狀態。在這裡，我無意掉哲學書袋，只是腦中不由得浮起這個「被拋」的意象。如果少年工的「被拋」有比較特別的地方，應該就是缺少一個可以保護他們的機制（政府或國家）。戰後選擇到大陸，以為可以免費讀大學的林文瑞，在歷經整肅、下放、牢獄之災之後，最後終於回到故鄉台灣，他在影片的末尾說：「不依靠政府，不依靠誰，自己要求自己的生存。」或許說出了戰後多數台灣人的心聲。

影片訪問的少年工，可以說是「餘生者」。相對於「餘生者」，我們想起從他們口中得知的被時代巨輪輾軋的同伴。有人在戰後的台灣努力學北京話，卻因為補習班老師是共產黨而成為思想犯；有人選擇回到祖國大陸，遇上文化大革命，不久傳來病死的消息；有人涉入二二八事件……。我忍不住想像他們當時可能感受到的顛倒錯亂與困惑。我們替影片中的少年工慶幸，佩服他們憑自己的力量，活過苦難，活過恐懼。但是，我們也要透過「聽」而聽到那沒有聲音的言說。以此，幾度重看《綠的海平線》，在這溫柔平和的敘事中，我的心情總是不平靜的。

如果1945年前後的台灣歷史很難理解，那麼《綠的海平線》無疑為我們打開一扇窗。年輕的朋友，讓我們在婆娑的知識之洋，一起眺望海平線，航向它！